

# 开展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 实验经济学研究

□ 罗 俊

**内容提要** 实验经济学为经济学日益科学化的进程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撑。一方面，中国可以为实验经济学方法提供“试验场”；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方法有助于以较小的社会成本，科学地检验政策的实际效果。本文认为，开展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需要研究者找到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问题，在实验设计中纳入中国情境，并判断实验结论是否能够得到规模化推广。本文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开展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提出了相应研究主题，并对实验经济学家在推动中国制度改革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未来使命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中国现实问题 实验经济学 方法论研究

作者罗俊，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杭州 310018）

## 一、引 言

实验经济学是交叉研究的产物，它是在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下，针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相关因素，使得被试者在模拟但更为简化的市场或其他经济环境中进行决策，通过观察、分析实验数据来检验、比较和完善已有的经济理论，并提供相应政策决策依据的学科。自1962年实验经济学创始人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发表第一篇规范的实验经济学论文以来，实验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2002年弗农·史密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共有5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8位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其中，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是利用经济理论与实验方法进行市场设计的巨擘，他为理论、实验和经济实践的完美结合作出了重要贡献。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杜弗若（Esther Duflo）、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则进一步扮演了实验经济学家“水管工”（plumber）的角色，借助随机干预实验承担各种公共政策的落实、调试和维护运转的任务，为实验经济学方法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并指导政策实践提供了绝佳案例。由此，实验经济学作为21

世纪以来经济学最前沿和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控的实验数据也成为经济学家日益重视的数据类型。

### （一）中国需要实验经济学

凭借实验经济学方法在检验经济学理论和评估经济政策效果上的独有优势，实验经济学研究能够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决策者在全新压力下做出选择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但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关系和行为模式的调整，旧体制通常表现出“顽固”的惯性，且体制机制一旦发生转变，结果将不可逆转。决策者对于各种改革与政策转变不得不小心谨慎，力求能够在决策前进行完整、周密的验证，这也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改革攻坚克难过程中发挥作用提出了挑战。

要提高决策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关键是要加强政策设计与政策评估的科学性，提高政府精细化管理水平和驾驭经济的能力。实验经济学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可控实验条件下研究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有助于识别、推断因果关系；实验经济学以较小的社会成本探索政策涉及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减少政策改革的阻力，检验政策的效果；实验经济学还可以针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设计实验环境，有的放矢地进行实验，以避免机制设计失误造成的社会损失。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采用了“总体渐进”和“试点先行”的路径，实验经济学与这些路径在力求降低改革的风险和成本这一指导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同时，相比通过“试点”积累经验的做法，实验经济学在事前采用的样本随机选取方法更加科学规范，在事中通过控制相关因素可以集中考察某一特定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具体作用，在事后也能以成本更低的方式完成政策的效果评估工作。

当代实验经济学方法在诸多领域的应用中取得成功、受到越来越普遍关注的根本原因是：在现实生活的经济实践中，针对改革和市场需求，实验经济学方法对经济政策的验证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刘鹤，2008）因此，如何运用经济实验方法，在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讲好中国故事、解决中国问题，将是极具挑战性和创新潜力的一项工作，也是推动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

### （二）实验经济学需要中国

实验经济学在各领域的应用研究正在兴起，而中国这片人口众多、面积巨大、有着独特文化背景的土地完全可以为实验经济学方法提供“试验场”，依赖这一天然的优势，中国经济学界也完全能为实验经济学贡献更多有独创性的研究实例。

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实验经济学有两条研究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中国人行为模式与西方人行为模式的可能差异，采用中国被试者，按照经典的实验设计程序进行实验，以检验中国文化背景下经典实验的结果是否会发生改变。Henrich等（2001）曾尝试开展此类实验。中国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情况、文化传统、地理条件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若能以区域间差异变量作为异质性指标，通过合理的手段遴选实验样本，开展大规模的行为博弈实验，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检验各变量对于中国人行为表现的影响，也可以在实践层面建立中国人处理利益冲突、利益分享时的行为特征数据库。

另一条路径则更具创新意义，它指的是基于中国本土问题与特色情境，围绕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涌现出的独有现象而展开的经济学实验。类似的实验研究已经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广泛开展，例如印度不同种姓人口之间的社会融合问题（Brooks等，2018）、印度尼西亚乡

村公路建设中的腐败问题 (Olken, 2007)、南非的小额信贷供给问题 (Karlan、Zinman, 2010) 等。发达国家的独有社会现象也在实验研究中被广泛关注, 包括以色列合作农场中个人的行为偏好 (Ruffle、Sosis, 2006)、法国地铁逃票现象 (Dai等, 2018)、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种族歧视问题 (Bertrand、Mullainathan, 2004) 等。因此, 围绕国家或地区的现实问题、独有现象开展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已成为重要研究方向。

## 二、如何开展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开展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既需要满足实验方法的科学性, 也要面临研究本身是否有实践意义的拷问。这与以下几个问题息息相关: 研究者是否能找到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问题? 如何在实验设计中纳入中国情境? 实验结论是否能够得到规模化推广?

### (一) 找到本土化问题

理论源于实践, 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推动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实践, 深入研究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揭示新特点、新规律, 进而在深入思考和准确回答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

开展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应更多聚焦国家重点关注的、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例如教育、医疗、住房、环境、城乡融合等领域的相关问题), 从而充分发挥实验方法在检验与评估政策效果方面的优势。近年来, 部分实验经济学家针对以下问题展开讨论: 寄宿制学校问题 (Yue等, 2014)、师资问题 (Loyalka等, 2019) 等。医疗问题也是实验经济学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陈叶烽等 (2020) 基于当前中国医生薪酬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在实验中设计了不同的薪酬激励方式, 考察激励方式的改变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 从而为医疗薪酬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开展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应更多聚焦中国实践中相比较世界先进国家或理论预期有待改进的领域。例如, 在现实中, 公租房分配机制尚不能完全解决公租房供需之间的缺口, 可能的原因是该机制没有按照理论上的最优匹配机制进行设计。邓红平、罗俊 (2016) 从理论上设计了较优的匹配机制, 并在实验中将其匹配效果与现实的公租房匹配机制进行比较。同样的实验思路也在高考录取机制 (Chen、Kesten, 2019) 和碳排放市场交易机制 (魏立佳等, 2018) 改革实践的研究中得到应用。

开展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应更多聚焦通过传统实证方法难以发现的中国经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例如, 在劳动力市场中可能存在着对劳动力的差别对待现象, 但这往往不能被经验数据反映, 而通过在实验中“虚构”不同类型的简历是最为直接的检验方法。李彬、白岩 (2020) 设计了一个简历投递的实地实验, 研究了硕士学历毕业生是否因其第一学历与其他人不同而受到招聘方差别对待的问题。葛玉好等 (2018) 通过在招聘网站上发布虚拟配对简历的方式, 研究了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基于性别的差别对待问题。

### (二) 中国情境的纳入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 经济学作为一门实

证科学的特征是预测经济未来和解释经济现实。而影响经济学预测未来准确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经济活动中的个体都是具有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人。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外部情境、历史文化和社会关系下，经济理论和人的实践活动可能是不同的。

在实验经济学方法问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者们对于实验结论的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非常关注，较为典型的有关外部有效性的问题就是抽象的实验环境是否能模拟现实社会中情境的问题。为此，实验经济学家将“真空”条件下的实验室实验（laboratory experiments）扩展为具备现实情境的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s）。已有的田野实验研究（Cronk, 2007）就发现，一旦文化、场景、社会关系等情境变量在实验中被引入或者被改变，人们的行为表现就会有所变化。

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当然也需要纳入中国传统文化情境和中国人特有的行动逻辑，从而实证地衡量中国情境对于人们行为偏好的影响。例如，“面子心理”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悠久的文化心理，“丢面子”“给面子”“要面子”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象征性词汇也在中国人的生活和人际交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Eriksson等（2017）通过在中国开展实验研究发现，人们愿意用金钱挽回自己或他人可能丢失的“面子”。另一个例子是：儒家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学者们也关注儒家文化价值观是否影响了社会规范、个人决策和经济增长的问题。Liu等（2014）在实验中通过让学生被试者阅读儒家经典来激发其儒家价值观，从而检验儒家价值观对个体经济决策的影响。

### （三）试点与规模化推广

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实施经济政策往往采取以局部试点探索为先，试点经验得到验证后再进行广泛推广的方式。学者们当然也关心政策实验（改革试点）在大规模推广后的效果。Wang、Yang（2021）收集1980—2020年中国政策实验的综合数据，构建了由中央部委发起的633项政策实验的数据库，记录每项政策实验在当地的实施情况，并追踪其在全国的推广情况。

随着随机控制实验的广泛运用，实验结论的外部有效性（即更好地将政策进行规模化推广）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话题。当变更政策干预地区或政策干预环境时，从随机控制实验中得到的结论通常需要适用于更广范围、一般意义上的政策依据。小范围随机控制实验大多基于特定的局部地区或者特定的群体展开，（Deaton, 2010）而一项能够成功推行的公共政策，通常涵盖广泛的受众群体与地域范围。

2018年，著名实验经济学家李斯特（John A. List）教授参与了一个在芝加哥贫困社区开办早教中心的实地实验项目，这个实验的目的是推动当地的教育公平。为了让在小规模尺度上得到的实验结论能够在大规模尺度上推广，李斯特提出了5个关键问题：第一，实验成功是否为偶然现象？第二，实验人员是否了解目标受众？第三，实验成功取决于专业人才，还是想法本身？第四，该实验是否有溢出效应？第五，该实验是否在供应侧或者成本侧有优势？这5个关键问题也是基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的结论能在较大范围内得到推广需要面临的检验标准。

## 三、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

### （一）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

现市民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如何平稳有序地将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进行角色转化，使其认同新市民的社会身份，促进新市民与本地市民之间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研究该问题时，与以往从宏观层面出发，侧重经济发展指标的实证研究有所不同，实验经济学家可以从微观心理与认知角度，探究社会身份给城乡居民带来的感受对他们行为表现的影响。Afridi等（2015）通过实验方法指出，户籍制度可能会固化人们对于不同户籍身份人群的认知，从而进一步拉大两种户籍身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质是“人”的融合发展，关涉的是不同身份人群之间的融合问题。新市民与本地市民之间的社会融合情况，在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可以通过能表征个体相互之间的互惠、公平、合作、信任等亲社会行为的行为博弈实验来体现。Dulleck等（2020）考察了被试者在博弈中面对城乡两类户籍身份人群时，所表现出来的互惠合作行为的差异。他们开展了田野实验，招募了本地城镇户籍与外地农村户籍的家政服务人员作为被试者，安排两种户籍身份的被试者随机扮演礼物交换博弈中的雇主和雇员。实验结果显示：即使本地城镇户籍与外地农村户籍被试者在个体行为特征与实际工作表现上均无显著差异，但相对于城镇户籍雇员，雇主会对农村户籍的雇员提供更低的劳动报酬。

城乡两类人群之间可能存在的群体间排斥或群体内偏好的现象，是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实验经济学家可以通过检验人们在面对与自己相同或不同身份的对手时的博弈行为是否存在差异来深入研究该问题。Luo等（2019）在实验中招募了农村户籍与城镇户籍的小学生开展最后通牒博弈，以此考察不同户籍的人群在公平分配决策时是否存在组外排斥或组内偏好的情况。罗俊、王鑫鑫（2022）同样运用田野实验方法，以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的小学生为实验对象，考察户籍身份的引入对小学生之间的公平分配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壁垒被逐渐打破，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流动。这个群体的子女，一部分跟随父母进城，成为流动儿童；另一部分留在了农村老家，由（外）祖父母养育，成为留守儿童。虽然外部社会环境或内部家庭结构发生改变可能会对这两个群体产生一系列影响，但仍没有太多实证研究证据表明，这两个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在行为表现上存在差异。近年来，陆续有实验经济学家对中国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行为偏好进行了实证分析，这对于及时设计针对处于弱势环境儿童的政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Luo、Wang（2023）招募了1080名四到六年级的农村留守儿童、农村非留守儿童、城市本地户籍儿童、城市流动儿童开展多种类型的行为博弈和个体决策实验。实验结果显示：留守和流动状态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亲社会行为及跨期决策的长期偏好；流动儿童迁移到城市的时间越长，其在行为决策方面的负面效应就越弱，甚至趋向于消失。

以上结论表明，目前留守和流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的心理及行为偏好，但流动到异地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可逆的。这意味着，在农村为留守儿童建立社会、学校、家庭联动的养育机制，并在城市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与本地居民建立公共服务权利均等化的教育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未来实验经济学家可以考虑从更加微观的层面，探究城乡融合发展下的公共服务权利均等化项目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改进问题。

## （二）教育公平与教育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近年来，中国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

量，推进教育公平，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当前中国教育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存在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差别。同时，人力资本供求错配现象仍然十分明显，影响了中国推进教育公平的进程。因此，亟须通过深化改革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教育赋能共同富裕。

中国提高贫困地区教育质量的方式主要是在教育供给端改善教学条件和提升教师质量。但仅在教育供给端加大投入可能不足以有效改善贫困学生学习质量。一方面，很多贫困家庭的教育投入往往没有达到最优水平；另一方面，贫困家庭对儿童入学和学习方面的消极态度是贫困家庭学生学习成绩差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为学生提供根据学习目标而设定的短期经济激励是解决贫困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一种方式，而实验经济学在探讨此类问题、设计激励方案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何青等（2022）通过设计一个针对小学生的现金激励的随机对照实验，发现通过对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施加适当的经济激励可有效激发贫困地区学生的学习动力，进而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

进入“十四五”时期，中国开启了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新的起点上，如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优质教育的需求，为贫困地区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服务，增强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是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结合扶贫项目的开展，就可以较为科学、有效、精准地为涉及贫困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助推政策提供效果检验依据。例如，Mo等（2020）开展随机控制实验，以评估计算机辅助英语学习对于学生学业成绩的效果。

新时代教育公平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围绕教育机会、条件、质量和保障公平，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发展深入推进。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利用信息干预的方式，以较低成本探究如何改善弱势学生所面临的先天机会不足问题。丁延庆等（2021）开展的有关高考生信息干预的大规模随机实验表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考生在专业选择和录取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这与其缺乏专业就业前景及预期收益相关信息有关；以本科专业对应起薪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干预导致超过20%的考生改变其专业选择意愿，改变了农村户籍考生的专业志愿选择行为，提高了这些考生优先选择经济回报较高专业的概率，并进一步提高了考生被经济回报较高专业录取的概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系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过程中，班级内部的课堂互动与社会交往效果对学生学业的作用及作用机理值得关注，但很少有直接证据揭示课堂互动情况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实验经济学方法可以通过控制其他相关因素，更为直接地检验这一效应。Lu、Anderson（2015）利用一所中学座位随机分配的机会，开展随机控制实验探究相邻学生的性别如何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问题。

教育数字化，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当前，在教育数字化领域，仍存在教师数字化能力有待提高、基于数字化的大学治理处于较低水平、教育数字化鸿沟明显等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在实验中可以较为方便地探究如何通过有效的激励方式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问题。基于此，Gong等（2021）在中国慕课中选择了2015年春季开设的两门课程进行田野实验，并借助行为经济学中的损失厌恶理论，设计实验组以激励760

名学员在课程中完成为期4周的家庭作业。他们在每轮实验中都将被试者随机分配到有不同激励额度和形式的实验组，以此探索推动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方式。可见，未来实验经济学家可以更多地结合行为经济学理论，设计并检验多种激励方式对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作用。

### （三）人口结构优化与人口高质量发展

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国人口呈现出严重的老龄化趋势，这将带来庞大的照料需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对照料需求有着深远影响，这引出了一系列问题：老年人健康与养老的关系究竟如何？健康干预政策对老年照料需求产生何种影响？健康和健康政策对家庭非正式照料和社会正式照料各有什么影响？要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绝非易事。由于上述变量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很难找到恰当且有力的识别策略。宗庆庆等（2020）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通过设计一项干预实验，使用外生手段对老年人健康状况产生冲击，然后观察实验组老年照料需求的变化。实验结果显示：事前的预防性健康干预政策能够显著减轻家庭在照料特别是社会照料方面的负担；对于内部非正式照料资源较少的家庭，预防性健康干预政策的减负效果尤为显著。

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社会也越来越关注独生子女问题。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在合作行为和社会交往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目前学界大部分讨论和研究以经验观察与问卷调查为基础，且不能回答导致两个群体之间行为决策产生差别的具体原因。Cameron等（2013）通过田野实验试图检验独生子女政策对个体行为偏好造成的影响。该研究以1979年为节点，分别招募1975年、1978年、1980年和1983年出生的被试者，通过进行独裁者博弈、信任博弈、公共品博弈、风险博弈、竞争博弈等经典的行为博弈实验，得到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后出生的被试者在行为偏好上的差异。

人口增长关乎家庭结构的稳定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近十年来，中国已对生育政策进行了多次完善和优化，但新的生育政策也给职业女性的权益保障带来了新的挑战。女性生育意愿下降的现象在职场女性中尤为明显。因此，出于对成本的考虑，企业可能会降低招聘女性员工的意愿，导致女性就业困难的问题更加严重。检验这一结论需要通过实验方法严格识别以上因果关系。He等（2023）利用2014—2015年实施的“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和2016年实施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冲击，在大型互联网招聘平台对雇主开展了两轮实地实验，识别了育龄女性的预期家庭责任与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可能面临的就业困难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该研究表明，保障女性合法就业权益是开放“三孩”政策的关键环节，需要国家、企业、家庭三方的共同支持，同时需要在充分保障女性合法就业权益的前提下，创造出鼓励生育的环境。

劳动力就业性别差异的形成除了与人力资本的差异、劳动力市场因素、社会性别规范和性别分工有一定关系，更与制度的影响和相应社会政策或政府干预的缺失息息相关。实验经济学方法可以通过比较在不同制度环境下成长的个体的行为偏好来检验上述关系。Booth等（2019）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制度对竞争性行为性别差异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一个人成长的关键阶段，其所处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会对其行为偏好产生显著影响。未来实验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实验方法比较相邻地区（或相近社会习俗）、不同社会制度下个体行为偏好的差异，并进一步检验更多制度对行为决策的影响。

### （四）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建设

科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从中汲取制度建设、道德建设的丰富营养，有助于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儒家文化价值观在东亚普遍存在，部分学者认为儒家文化价值观会影响社会规范、个人决策和经济增长。但是现有文献大多偏向于民族志研究，缺少儒家文化价值观与经济绩效之间因果关系的实证依据，而实验经济学可以通过在实验中引入文化观念直接检验文化对行为表现或行为偏好的影响。Liu等（2014）在实验中通过启动方法引出被试者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以及信任和可信任行为，认为儒家文化价值观对中国治理的影响被系统性低估。

有关文化对个人经济行为的文献大多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忽略了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也可能导致个人经济行为改变的问题。同时，这些文献较少解释导致经济行为改变或差异的内在文化特征。采用实验方法探究文化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影响就可以有效避免以上两点问题。Chen、Tang（2009）利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考察在厦门的汉族人、在西藏的藏族人和在新加坡的汉族人的经济行为差异。实验结果表明，被试者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个人经济行为无显著影响，而个人经济行为差异主要与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有关。总体而言，文化会对个人经济行为有重要影响。

“面子心理”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心理，人们往往愿意牺牲金钱或其他资源挽回自己或群体的“面子”，但是对于“面子心理”的测度和刻画却不容易实现。在实验研究中，研究者利用公开信息的方式可以较好地检验“面子”的价值。Eriksson等（2017）通过实验方法研究了人们是否愿意花费金钱以避免个人或团队的表现比其他人或其他团队差的情况被公开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上述情况被公开导致的负面情绪给个人带来的道德成本高于避免上述情况被公开所产生的金钱成本，即大多数人愿意牺牲资源保护“面子”。

现有研究指出各国不同地区和各国之间的经济偏好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被认为与经济发展存在因果关系。而合作偏好与其他经济偏好类似，不同文化和社会对合作的偏好也各不相同。然而，大部分合作偏好的文化和历史起源仍未被探索。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可以通过比较采用不同农业生产方式的区域之间居民的行为差异来探究行为偏好的演化过程。Zhou等（2023）通过实验方法考察中国历史农业活动的区域差异与现代中国人的合作偏好差异之间的联系，探索合作偏好的文化和历史起源。进一步地，未来实验经济学家也可以利用实验方法探究中国不同区域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各类行为偏好形成与演化的作用。

#### （五）劳动关系与企业、组织高质量发展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面临新挑战。学者们通过在实验中设计与比较不同的管理方式，研究与劳动生产关系相关的问题。Cai、Wang（2022）通过一项在中国汽车制造厂的随机对照实验，探究了员工对管理者进行评估能否影响员工和企业生产率的问题。研究表明，像评估、打分等为员工提供反馈的方式可以在显著降低员工离职率的同时，提高团队的生产率。此外，为员工提供反馈的方式也能够提高员工的幸福感和积极情绪水平，这些结果是由管理者行为的变化以及管理者和员工之间总体上更好的关系所驱动的。

主观绩效评估被企业和政府广泛用来提供工作激励。然而，相对于为实现组织本身的目标而工作，员工可能会投入过多的精力去讨好他们的领导。尽管有不少文献从理论上探讨了逢迎行为的前因和后果，但相关方面的经验证据非常缺乏。通过随机实验的方法可以分析不同的评价机制，量化逢迎行为的存在和影响。De Janvry等（2023）设计了一个随机实验，发现当下属不确定

谁是考核领导时，他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最终导致各方对其工作表现的评价都更高。

淘宝网等线上购物平台在过去20年间发展迅速。买家们在享受网络购物给他们带来的多样性和便捷性等好处的同时，也时刻面临掉入“购物陷阱”的风险。只有有效的买家评价反馈和商家真实信誉才能促进信任在陌生的买卖双方之间建立，从而使潜在的线上购物交易成为现实。然而，评价反馈往往是耗时的，除非买家认为其能从反馈行为对后来购物者的帮助中获益，否则，很少有人会提供真实的、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购物评价。在实验中可以通过相关机制设计来研究增加购物评价的有效激励方式。Li等（2020）使用来自在线市场的数据检验淘宝网设计的反馈奖励机制对线上购物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卖家可以通过用奖励建立声誉并表明其产品高质量的方式受益。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远程办公成为可能，并推动了弹性工作制的广泛应用。弹性工作制作作为一种重要的非货币工作特征，常常被认为是影响员工工作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员工在多大程度上看重弹性工作制呢？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的实质是对劳动经济学中重要的补偿性工资差异理论进行检验。实验经济学可以使用随机控制法来检验不同工作条件给申请者带来的真实收益。He等（2021）在中国的一个大型在线招聘平台对求职者开展实地实验，通过在求职场景中外地改变弹性工作条件和工资特征条件，获得高质量的显示性行为偏好数据。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无弹性工作条件的工作，求职者对具备弹性工作条件的工作的申请率有显著提高，尤其对同时具有时间和地点弹性工作条件的工作的申请率提高幅度最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大多数社会组织建立了以岗位为基础的薪酬管理制度。但总体而言，在一些社会组织的薪酬管理过程中仍然存在分配不公平、发放不规范等问题。其中，企业组织中临时工的薪酬待遇普遍低于正式员工的问题备受关注，但目前较少有研究深入探究临时工工资模式与正式工工资模式的具体区别。通过实验方法，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对比这两种工资模式导致的员工工作表现差异，从而考察临时工与正式工薪酬待遇差别的影响。Chi等（2019）通过实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短期的雇佣关系中，计件工资模式能够对员工进行有效激励；在长期且稳定的雇佣关系中，固定工资加奖金的模式对员工的激励效果与计件工资模式相差不大。未来实验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实验经济学方法，深入探究不同激励方式、组织模式、管理机制对生产效率与企业绩效的作用。

#### （六）医疗服务与深化医疗改革

党的二十大对持续深化医疗改革作出全面部署，首先体现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上面。抗生素的使用为人类战胜感染性疾病开辟了一条捷径，但抗生素滥用问题也随之而来。聚焦医生为何滥用抗生素的问题，两个竞争性假设是医生具备经济动机和患者存在需求。通过实验方法开展审计研究（audit study）可以更好地分离这两种动机。Currie等（2014）的实验结果表明，减少开处方的经济激励可能是减少抗生素滥用的最有效方法。鉴于政府在实施相关政策时面临的困难，该研究还提出了其他方法，这些方法也可能减少抗生素滥用，例如患者向医生展示其掌握关于抗生素的知识可以显著降低抗生素的处方率。

为提高医院服务效率和质量，自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出台政策，试图增加医院预算分配、调整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支付方式、加强规划和治理、重建转诊制度、提高私营部门的作用。然而，制药公司仍然会通过给医生一定激励的方式，使得医生多开某些特定药物的处方。通过让实验员“扮演”病人来考察医生在面对不同条件的病人时所开处方药的选择可以较好地检验

这一现象的存在。Lu (2014) 在实验中采用了“2×2”的干预设计, 该设计有以下两个维度: 患者自己描述有政府医疗保险或没有医疗保险; 在开处方之前, 医生被告知患者有意从医生所在的医院购买药品或有意从其他地方购买药品。实验结果表明, 当医生期望从患者的药物支出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收益时, 他们给有医疗保险的患者开出的药物会比给没有医疗保险的患者开出的药物更贵。未来实验经济学家还可以发挥实验经济学在因果关系识别上的优势, 围绕医疗制度改革、医患关系进行相应研究。

#### 四、结 语

近十年来, 已经有越来越多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问世, 这些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 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研究, 距离“立足中国、解释中国、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中国的实验经济学家们还未能真正做到“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 立足中国实际, 解决中国问题”, 还没有达到外界对中国的实验经济学家在推动中国制度改革和政策出台过程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期望。基于此, 中国的实验经济学家在努力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 还有如下使命:

一方面, 让中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能够更多地了解实验经济学并认识到其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上的应用价值。中国的实验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对实验经济学方法论的积极讨论, 来向外界展示以下内容: 实验经济学的科学属性 (洪永森等, 2016; 周业安、孙琦凡, 2021)、实验经济学对真实世界的有效解释 (罗俊等, 2015; 陆方文, 2020)、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汪丁丁, 1994; 包特等, 2020)。与此同时, 中国的实验经济学家要积极推动国内实验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的建立, 并进一步扩大该学术共同体的影响力, 也要主动与政府、企业、组织机构对接, 向其解释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意义和实验经济学方法在国家治理的政策试点与评估中的作用 (王思琦, 2022; 陈叶烽等, 2023)。

另一方面, 促使更多中国的实验经济学家进行更优秀的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国的实验经济学家要瞄准中国重大现实问题, 心怀“国之大者”, 扎根中国大地,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应关注理论研究上的重大创新, 还应把注意力转向现实需要, 利用实验方法在教育精准扶贫 (史耀疆等, 2020)、数字平台发展 (Li等, 2020)、医疗体制改革 (陈叶烽等, 2020)、老年健康照料 (宗庆庆等, 2020)、税收征缴助推 (代志新等, 2023)、贫困地区教养方式 (陈叶烽等, 2024) 等领域获得更多中国经验。中国的实验经济学家还需要在国内多个平台发布实验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让更多优秀的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得到关注, 让更多想要开展面向中国现实问题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得到启发。

#### 参考文献:

1. 包特、王国成、戴芸:《面向未来的实验经济学:文献述评与前景展望》,《管理世界》2020年第7期。
2. 陈叶烽、刘莹、杨雯渊:《公共政策评估与随机控制实验——基于“规模化”视角的经验启示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3年第3期。
3. 陈叶烽、丁预立、潘意文、金菁、姚沁雪:《薪酬激励和医疗服务供给:一个真实努力实验》,《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4. 陈叶烽、杨雯渊、罗干松、王宇、李飞:《相对贫困地区的教养方式与儿童行为偏好:来自实地实验的证据》,《管理世界》2024年第12期。

5. 代志新、高宏宇、程鹏:《行为助推对纳税遵从的促进效应研究》,《管理世界》2023年第6期。
6. 邓红平、罗俊:《不完全信息下公共租赁住房匹配机制——基于偏好表达策略的实验研究》,《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7. 丁延庆、杜立珍、李伟、伍银多、杨晋、叶晓阳:《信息干预对高考志愿专业选择的影响——来自大规模随机实验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6期。
8. 葛玉好、邓佳盟、张帅:《大学生就业存在性别歧视吗?——基于虚拟配对简历的方法》,《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4期。
9. 何青、王军辉、甘犁:《为贫困生教育赋能——一项随机对照田野实验研究》,《管理世界》2022年第9期。
10. 洪永森、方颖、陈海强、范青亮、耿森、王云:《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若干新近发展及展望》,《中国经济问题》2016年第2期。
11. 李彬、白岩:《学历的信号机制:来自简历投递实验的证据》,《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
12. 刘鹤:《前言》,收自杜宁华:《实验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 陆方文:《随机实地实验:理论、方法和在中国的运用》,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14. 罗俊、汪丁丁、叶航、陈叶烽:《走向真实世界的实验经济学——田野实验研究综述》,《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3期。
15. 罗俊、王鑫鑫:《户籍身份、社会融合与公平分配——来自小学生田野实验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2022年第4期。
16. 史耀疆、张林秀、常芳、刘涵、唐彬、高秋风、关宏宇、聂景春、杨洁、白钰、李英、汤蕾、岳爱、茹彤:《教育精准扶贫中随机干预实验的中国实践与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8期。
17. 汪丁丁:《实验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建设》,《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7期。
18. 王思琦:《中国政策试点中的随机实验:一种方法论的探讨》,《公共行政评论》2022年第1期。
19. 魏立佳、彭妍、刘潇:《碳市场的稳定机制:一项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20. 周业安、孙琦凡:《实验发展经济学:理论、方法和困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21. 宗庆庆、张熠、陈玉宇:《老年健康与照料需求:理论和来自随机实验的证据》,《经济研究》2020年第2期。
22. Afridi, F., Li, S. X. & Ren, Y., "Social Identity and Inequality: The Impact of China's Hukou Syste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5, 123: 17-29.
23. Bertrand, M. & Mullainathan, S., "Are Emily and Greg More Employable than Lakisha and Jamal? A Field Experiment on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4): 991-1013.
24. Booth, A., Fan, E., Meng, X. & Zhang, D., "Gender Differences in Willingness to Compete: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Economic Journal*, 2019, 129(618): 734-764.
25. Brooks, B. A., Hoff, K. & Pandey, P., "Cultural Impediments to Learning to Cooperate: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High- and Low-Caste Men in Rural Indi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 115(45): 11385-11392.
26. Cai, J. & Wang, S. Y., "Improving Management through Worker Evaluations: Evidence from Auto Manufactur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2, 137(4): 2459-2497.
27. Cameron, L., Erkal, N., Gangadharan, L. & Meng, X., "Little Emperors: Behavioral Impact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cience*, 2013, 339(6122): 953-957.
28. Chen, Y. & Kesten, O., "Chinese College Admissions and School Choice Reforms: An Experimental Stud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2019, 115: 83-100.
29. Chen, K. & Tang, F. 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ibetans and Ethnic Han Chinese in Ultimatum Bargaining Experi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9, 25(1): 78-84.
30. Chi, W., Liu, T. X., Qian, X. & Ye, Q.,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Incentive Contracts for Short- and Long-Term Employe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9, 159: 366-383.
31. Cronk, L.,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Framing on Play in the Trust Game: A Maasai Exampl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07, 28(5): 352-358.
32. Currie, J., Lin, W. & Meng, J., "Addressing Antibiotic Abuse in China: An Experimental Audit Stud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4, 110: 39-51.

33. Dai, Z., Galeotti, F. & Villeval, M. C., "Cheating in the Lab Predicts Fraud in the Field: An Experiment in Public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2018, 64(3): 1081-1100.
34. De Janvry, A., He, G., Sadoulet, E., Wang, S. & Zhang, Q., "Subjec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fluence Activities, and Bureaucratic Work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3, 113(3): 766-799.
35. Deaton, A., "Instruments, Randomization, and Learning abou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0, 48(2): 424-455.
36. Dulleck, U., Fookan, J. & He, Y., "Hukou Status and Individual-Level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n Experiment in China", *ILR Review*, 2020, 73(3): 628-649.
37. Eriksson, T., Mao, L. & Villeval, M. C., "Saving Face and Group Identity", *Experimental Economics*, 2017, 20: 622-647.
38. Gong, J., Liu, T. X. & Tang, J., "How Monetary Incentives Improve Outcomes in MOOC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21, 190: 905-921.
39. He, H., Neumark, D. & Weng, Q., "Do Workers Value Flexible Jobs? A Field Experiment",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21, 39(3): 709-738.
40. He, H., Li, S. X. & Han, Y.,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 Correspondence Study with Policy Change in China",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23, 41(2): 361-387.
41. Henrich, J., Boyd, R., Bowles, S., Camerer, C., Fehr, E., Gintis, H. & McElreath, R., "In Search of Homo Economicu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2): 73-78.
42. Karlan, D. & Zinman, J., "Expanding Credit Access: Using Randomized Supply Decisions to Estimate the Impact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 23(1): 433-464.
43. Li, L., Tadelis, S. & Zhou, X., "Buying Reputation as a Signal of Quality: Evidence from an Online Marketplac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51(4): 965-988.
44. Liu, E. M., Meng, J. & Wang, J. T. Y., "Confucianism and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Lab Experiments in Taiwan and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4, 104: 106-122.
45. Loyalka, P., Sylvia, S., Liu, C., Chu, J. & Shi, Y., "Pay by Design: Teacher Performance Pay Desig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tudent Achievement",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9, 37(3): 621-662.
46. Lu, F., "Insurance Coverage and Agency Problems in Doctor Prescription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4, 106: 156-167.
47. Lu, F. & Anderson, M. L., "Peer Effects in Microenvironments: The Benefits of Homogeneous Classroom Group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5, 33(1): 91-122.
48. Luo, J., Chen, Y., He, H. & Gao, G., "Hukou Identity and Fairness in the Ultimatum Game", *Theory and Decision*, 2019, 87(3): 389-420.
49. Luo, J. & Wang, X., "Leave Behind or Migrate?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Concerning the Impact of Being Left Behind/Migrating Status on Children's Behaviour and Preferenc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3, 79, 101982.
50. Mo, D., Bai, Y., Shi, Y., Abbey, C., Zhang, L., Rozelle, S. & Loyalka, P., "Institutions, Implementation, and Program Effectivenes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of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0, 146: 102487.
51. Olken, B. A., "Monitoring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onesi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 115(2): 200-249.
52. Ruffle, B. J. & Sosis, R., "Cooperation and the In-Group-Out-Group Bias: A Field Test on Israeli Kibbutz Members and City Resid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6, 60(2): 147-163.

(下转第41页)

会进一步加强，激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的矛盾。如何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实现人文经济属性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必须极端重视、尽早破题的重大问题。

再次，要确立人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应有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五大特征，虽然都包含人的现代化因素，但是，我们是否应该明确地强调人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如何通过思想解放、制度变革和组织创新来支持实现人的现代化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如何将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有机地纳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建设之中，强化和突出这些领域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中的根本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最后，要全面深入挖掘古今中外的人文经济思想资源，把人文经济学研究作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来加以重视。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开展的工作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文经济学向度研究；第二是西方经济思想中的人文主义传统研究，特别是挖掘自18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第三是中国古代的人文经济思想研究。除此以外，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识之士的思考也是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并从中汲取有益成分的。

####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1期。
4.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一卷），胡尧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责任编辑 张翔宇

---

（上接第53页）

53. Wang, S. & Yang, D. Y.,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Learning”, *NBER Working Paper*, 2021, No. w29402.

54. Yue, A., Shi, Y., Chang, F., Yang, C., Wang, H., Yi, H., Luo, R., Liu, C., Zhang, L., Chu, J. Y. & Rozelle, S., “Dormitory Management and Boarding Students in China’s Rural Primary Schools”,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4, 6(3): 523-550.

55. Zhou, X., Alysandratos, T. & Naef, M., “Rice Farming and the Origins of Cooperative Behaviour”, *Economic Journal*, 2023, 133(654): 2504-2532.

责任编辑 张翔宇